

以驳斥。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，只好虚与委蛇，暂时向八大臣妥协，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。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极不赞成，慈禧于是串通慈安，并且使用苦肉计，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，与恭亲王奕訢串通。

奕訢是咸丰的亲弟弟，为人机智、练达，很有才干，但一直遭到咸丰帝的猜忌，因此，虽贵为亲王，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。咸丰逃亡热河之际，命令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一起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。奕訢和文祥多年来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，对他们可以说是恨之入骨。正是基于这些，他们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，决定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。

1961年10月，奕訢经多次申请，才得以以“奔丧”的名义赶到热河。在咸丰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，他谒见了两宫太后，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，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。奕訢回到北京后，笼络驻扎在京、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，做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。

在从承德回北京时，慈禧以皇帝年幼，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，随灵柩走了一天，就决定和载垣、端华等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，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。11月1日刚到北京，慈禧就迫不及待地接见了恭亲王奕訢、军机大臣文祥等人。第二天一早，奕訢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御印的圣旨，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，当场逮捕了载垣、端华，又命令将景寿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等撤职查办，严加看管，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。不久（8日），慈禧发布上谕，否认咸丰遗诏，下令将肃顺斩首，让载垣、端华自尽，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。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“不能尽心和议……以致失信于各国”。这也就等于向侵略者表示，她慈禧是“尽心和议”的卖国贼。接着（11日）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“祺祥”年号，改明年（1862年）为同治元年，东、西二太后垂帘听政，加封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大臣、军机大臣领班，奕譞、文祥、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。1861年是农历辛酉年，故这次政变被称为“辛酉政变”或“祺祥政变”，又因为发生地点在北京，所以也常被称为“北京政变”。

史实点拨：

“辛酉政变”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执政大权的一次宫廷政变。慈禧太后在政变中赢得了胜利，以此为开端，她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。这次政变也是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的开始，慈禧太后掌控下的晚清政府“借师助剿”，“尽心和议”，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。

（三）容闳与幼童留美

容闳，字达萌，号纯甫。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（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）。

1840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，1846年底毕业。第二年获资助赴美留学。先后在马塞诸塞州的茫森学校和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，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，获耶鲁大学文学士（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），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。长期的美国教育使容闳广泛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，了解了美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状况，形成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，但这没有动摇他报效祖国的决心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放弃了在美国定居、谋求优越地位的机会，于1855年毅然回到祖国。

回国以后，容闳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、香港高等审判厅、上海海关等处任职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，后来又自营商业，并投入“师夷自强”的洋务运动。

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，容闳1860年至太平天国都城天京，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、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、建立有效能的政府、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，但“未敢信其必成”，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。1862年夏，容闳来到湘军安庆大营，从此开始了他与洋务派长达20年的合作关系。他为洋务派出谋划策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。1863年，他受曾国藩委派，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，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。1867年，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军机处呈递的条陈中，第一次提出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想法。1870年他重提这个计划，得到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官僚的支持，因而最终获得清政府批准。

按照计划，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。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，至1875年派完，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。当时，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，尤其是美国，距离中国万里之遥。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，都认为那里是“蛮夷之邦”，因此幼童的招募工作十分困难。经过容闳等人的艰苦努力，4批幼童共120人最后招齐。他们主要来自沿海省份，仅广东一省就占了70%。从年龄上说，最小的10岁，最大的16岁，主要在11~14岁之间。

1872年容闳奉命率首批学生30人赴美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。容闳任学生监督，兼任驻美副使，长期驻美，负责学生的管理和生活。留美幼童在美国生活日久，在礼俗、服饰、辫发、读书等问题上逐渐有了些变化，逐渐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。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，但却被负责留学生事宜的留学监督陈兰彬等人视为大逆不道。他奏请朝廷，主张将幼童召回。一些本来就反对派遣留学生的守旧派也兴风作浪，大谈留学教育利少弊多。结果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等也相信留美学生“见异思迁”，洋化极深。1881年夏，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。“中国幼童留美运动”中途而废。

原定幼童留美期限为15年，但到撤回时，在美时间最长的也只有9年。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刚从大学毕业。留美学生半途撤回，使容闳极为苦闷。他愤而退出洋务运动，与洋务派的关系逐渐疏远。而这些中途回国的留美学生，起初也备

受冷落。他们的工作安排不当，官阶最底，待遇仅与一般技工相仿。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困难条件下仍奋力而为，证明自己能对富国强兵有所贡献。同时，李鸿章出于办洋务的需要，奏请清政府“破格从优给奖，以昭激励”。于是这批归国学生日益得到重用。据统计，他们中从事外交洋务（包括海关）的有31人，从事海军和航运的有28人，从事电报事业的有18人，从事铁路事业的有16人，从事矿业的有8人，从事商业的有7人，从事医务的有5人，从事教育的有4人。他们经过多年奋斗，大多成为政界、军界、商界的知名人士或各行各业科技骨干。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作出的贡献为国人所称道，唐绍仪在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内阁总理，抵制过袁世凯称帝。他们就是留美幼童中的优秀代表。

史实点拨：

“幼童留美”是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开端，其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这一运动不仅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式科技人才，而且还向闭塞落后的中国社会引入了新的知识，使人们大开了眼界，转换了社会风气。容闳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（四）公车上书

1895年，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，于是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，结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规定割让台湾省、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，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白银。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立即发动广东、湖南来参加会试的举人签名，于3月28日呈上一封《上皇帝书》，反对割地赔款。康有为觉得参加人数还不够多，声势也不够大，就鼓动18省举人都来上书。于是，举子们“连日并递”，弄得“章满察院，衣冠塞途”，有的甚至围住朝廷大臣的车，请求不要批准《马关条约》。特别是台湾省的举子，更是“垂泣而请命”，路人见了都为之哀痛落泪。康有为看到这种情况，认为“士气可用”，就联合18省举人于5月1日在宣武门外的松筠庵集会，向各省举人陈说《马关条约》丧权辱国的内容以及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。到会举人无不义愤填膺，决议联名上书皇帝，并推康有为起草。康有为用一天两夜的时间，写成一篇万余言的奏书，请求皇帝下诏拒签条约，提出迁都定天下之本，练兵强天下之势，变法成天下之治。奏书上签名的举人有1300余人之多。这一天，本来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但正当约定上书时间，却突然“大雨震电，风雹交作”，齐聚在松筠庵的举子们见突然“气象愁惨”，都很感叹，大家闷闷不乐。果然，奏书投递上去之后，“察院以既已用宝，无法挽回”为由，拒绝接受。这次上书虽最终被清政府拒绝，但康有为起草的洋洋洒洒一万数千言的奏书却经举子们的传抄，在社会上广泛流布，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。

那么，这次上书为什么称为“公车上书”呢？原来汉代时就规定，地方上